



五四时期“四大副刊”研究

● 员怒华 / 著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四大副刊”研究

本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提供的出版基金全额资助

五四时期“四大副刊”研究

◎ 员怒华 / 著

新出图证(鄂)字1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时期“四大副刊”研究/员怒华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6

(新闻与传播研究文库)

ISBN 978-7-5622-8295-2

I. ①五… II. ①员… III. ①期刊—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G23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8173号

五四时期“四大副刊”研究

◎ 员怒华 著

责任编辑: 石亚培 冯会平

责任校对: 罗 艺

封面设计: 罗明波

编辑室: 学术出版中心

电话: 027-67863220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152号

邮编: 430079

电话: 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mail.ccnu.edu.cn

印刷: 武汉鑫昶文化有限公司

督印: 王兴平

字数: 211千字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2.5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5.00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从边缘到中心：“四大副刊”的崛起	7
第一节 副刊的发生与发展	7
一、副刊的发生	7
二、发生期的副刊	10
三、副刊的定型	12
第二节 “五四”副刊的变革	17
一、副刊变革的历史动因	17
二、“四大副刊”的崛起	26
三、从边缘到中心	34
第二章 “四大副刊”与“五四”新文化公共空间的建构	36
第一节 新文化公共空间的创立	36
一、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各方言说	36
二、何为新文化公共空间	42
三、《新青年》与新文化公共空间的开创	43
四、“四大副刊”与新文化公共空间的拓展	49
第二节 新文化公共空间中的“四大副刊”	52
一、作为新文化传播媒介的“四大副刊”	52
二、作为新文化公共论坛的“四大副刊”	58
三、作为新文化批评空间的“四大副刊”	78
第三章 “四大副刊”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开展	92
第一节 科学与民主的倡导	92

一、现代科学的推广	93
二、民主观念的普及	103
第二节 各种主义的输入	108
一、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108
二、社会主义的传输	116
三、实用主义的引介	121
第四章 “四大副刊”与“五四”新文学的生成	126
第一节 “四大副刊”与新文学主体的培育	126
一、新文学创作的平台	127
二、新文学读者的培养	141
第二节 “四大副刊”与新文学文体的探索	153
一、“四大副刊”与新诗	153
二、“四大副刊”与小说	163
三、“四大副刊”与散文	171
四、“四大副刊”与戏剧	177
结 语	185
参考文献	186

导 论^①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现状

中国的报纸副刊自诞生至今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无疑是副刊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著名作家沈从文曾说：“在中国报业史上，副刊原有它的光荣时代，即从五四到北伐。北京的‘晨副’和‘京副’，上海的‘觉悟’和‘学灯’，当时用一个综合性方式和读者对面，实支配了全国知识分子兴味和信仰。国际第一流学者罗素、杜威、太戈儿、爱因斯坦的学术讲演或思想介绍，国内第一流学者梁启超、陈独秀、胡适之、丁文江等等重要论著或争辩，是由副刊来刊载和读者对面的。南北知名作家如鲁迅、冰心、徐志摩、叶绍钧、沈雁冰、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玄庐、大白……等人的创作，因从副刊登载、转载，而引起读者普遍的注意，并刺激了后来者。新作家的抬头露面，自由竞争，更必需由副刊找机会。”^②知名学者李欧梵先生则认为：“报纸的‘副刊’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它非但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独特传统，而且也提供了一个‘媒体’的理论：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是和印刷媒体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报章杂志特别重要，然而西方报纸并没有一种每日刊行的副刊。”^③

毋庸置疑，中国的报纸副刊是值得研究的，而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更

① 五四时期在本书中指1919年至1928年这一时段。为论述方便，有时简称“五四”。

②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47—448页。

③ 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李欧梵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

值得研究,因为“四大副刊”作为中国报纸副刊的成功样本,蕴藏了相当丰富的资源,在新闻史、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文献史等诸多方面均有挖掘的价值。遗憾的是,“四大副刊”的研究十分薄弱,除罗贤梁的《报纸副刊学》与冯并的《中国文艺副刊史》等副刊专著列了专章予以论述,将“四大副刊”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专著至今未能见到,研究论文也极少。许志英的《〈觉悟〉、〈学灯〉、〈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的终刊日期》对四个副刊终刊的日期进行了考订,补充了“四大副刊”研究的史料;笔者的《副刊的崛起——论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只是简略地阐述了“四大副刊”崛起的历史意义;谢庆立有关五四时期副刊的系列论文选题极有价值^①,但基本上是以“四大副刊”作为他论文观点的例证,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四大副刊”研究。因此,可以说几乎未见到有分量的研究论文。

如果说近年来“四大副刊”的研究还有所突破的话,则主要表现在单个副刊的研究上。张涛甫的专著《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以〈晨报副刊〉为例》试图从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这一视角对《晨报》副刊进行解读;樊亚平、吴小美关于《晨报》副刊的系列论文分别对《晨报》副刊的三个主要时期——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时期进行了分析评价^②;陈捷关于《京报副刊》的系列论文选取了多种视角切入《京报副刊》的研究^③;叶永胜的《王统照与〈文学旬刊〉》充分肯定了文学研究会附着于《晨报》副刊之上发行的《文学旬刊》及其主编王统照对于新文学的贡献;朱寿桐的《〈学灯〉与“新文艺”建设》则探讨了《学灯》副刊在新文学建设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① 谢庆立:《在编读互动中寻求创新——五四时期报纸副刊编辑艺术探析》,《新闻战线》,2008年第2期;《搅活一池春水——论五四时期副刊文化主体与副刊文本建构》,《青年记者》,2008年第4期;《把握时代主流,“趣味”“学理”并重——五四时期著名报纸副刊的文化传播策略》,《青年记者》,2010年第35期。

② 樊亚平、吴小美:《一个新式副刊的诞生——〈晨报〉副刊研究之一》,《兰州商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理性启蒙中的〈晨报〉副刊——〈晨报〉副刊研究之二》,《兰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晨报”,我的喇叭——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③ 陈捷:《京报副刊青年题材小说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民国文艺副刊合订本的出现及其文化意义——以〈京报副刊〉为例》,《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二十世纪二年代中国戏剧现代性之考察——以〈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为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现代学术与大众传媒的互动——以〈京报副刊〉广告栏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单个副刊的研究能够为“四大副刊”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有代表性的成果也并不是很多。

什么缘故导致了“四大副刊”的研究如此薄弱？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四大副刊”虽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每一个副刊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即使是同一副刊在不同时期也会呈现出不同风貌，因此，要把“四大副刊”作为一个整体对它的基本特点与特色进行客观准确的概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查阅爬梳大量的一手资料。即使像罗贤梁的《报纸副刊学》与冯并的《中国文艺副刊史》只是列专章对“四大副刊”的基本内容进行概括与论述，也需具备一定的功力，撰写专著进行深入的开掘与充分的阐述则难度更大。

其次，“四大副刊”的内容异常丰富繁杂、零碎琐细，涉及面十分广泛，这一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研究空间，能够从不同角度切入，但另一方面由于内容过于杂而碎，牵扯面太广，很不容易形成专题，正如陈平原所说：“相对说来，报纸副刊因面目不如同人杂志清晰，再加上资料搜集难度很大，不太容易成为专题研究的对象。”^①

第三，“四大副刊”研究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与研究能力是极大的考验。近年来学术界并未忽视“四大副刊”以及其单个副刊的研究，但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有些文章包括一些博士论文选题虽好，但资料工作做得不够扎实，以至于要么论述空泛不够深入，要么论点的说服力不够，缺乏有力的材料支撑。二是缺乏新的理论视角以致停留在史料的梳理上。因此说，不仅“四大副刊”的研究十分薄弱，即使是单个副刊的研究也还有待于突破。

由上述分析可知“四大副刊”的研究难度极大。笔者不揣浅陋选择此选题是因为始终坚信“四大副刊”是一座富矿，我们理应进行开掘。而此选题能够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的资助，也说明了它的价值和意义。笔者自知本书问题不少，上面分析的“四大副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书同样存在。然后，学术研究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本书如果能为“四大副刊”的研究做一些基础性的铺垫工作，笔者就知足了。

^① 陈平原：《文学的周边》，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30页。

二、基本概念与内容

1. 概念界定

(1) 副刊

中国报纸副刊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副刊诞生至“五四”；二是“五四”至20世纪80年代；三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五四之前的副刊主要是单一的通俗性文艺副刊，其功能是娱乐消闲。五四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一些副刊开始谋求变革，由单一的文艺副刊转变为集文艺性、新闻性、思想性、理论性、知识性为一体的综合性文艺副刊，一改过去一味的娱乐消闲，成为了传播精英文化的阵地。在副刊形式上，五四时期的副刊往往是版面式副刊与附张式副刊同时附属于一张报纸。不过，版面式副刊一般是报纸的正规副刊，附张式副刊与报纸的关系较为松散：有的是报纸自身所办，有的则不是报纸自身所办，且周期都不太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副刊进行了第二次变革。副刊的消闲性、服务性、实用性得到强化，文艺性、思想性、理论性则大大弱化，副刊再次成为通俗文化的载体。这一时期副刊由于版面增多，专刊、周刊成为副刊的主要形式。

从以上简要的回顾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报纸副刊从诞生至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便给副刊的界定带来困难。“五四”副刊的变革打破了消闲性文艺副刊一统天下的局面，确立了综合性文艺副刊在报界的地位，从此，新旧副刊同时并存。这在当时曾引发过一场关于副刊的讨论。资深副刊编辑张恨水提出了“甲副刊类，乙杂俎类”的观点，以此区分新旧副刊。曾担任过《京报副刊》编辑的吴秋尘也认为“副刊与文艺版并不是一回事”。“所谓文艺版，就是普通人所谓的报尾巴”，“和副刊微有不同。例如副刊上所登的讲演录，有如一篇讲义，而文艺版之登载一二名言，则仅能视为补白，所以副刊是不独立而独立”，“文艺版是独立而又不能独立”的“报之一部”^①。张恨水、吴秋尘将副刊与文艺版截然分开显然是不合理的，副刊是在文艺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艺版理应包含在副刊之内。吴秋尘所说的“不是一回事”，实际上是指新旧副刊的不同。戈公振没有论及新旧副刊的关系，但坚持主张：“副张之材料，必以文艺为基础。”^②强调了副刊的文艺性。这种观点后来一直被认可，1979年版的《辞

①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1页。

②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200页。

海》中便这样界定副刊：副刊“一般指报纸上刊登文艺作品或理论文章的固定版面”^①。这一界定虽然过窄，但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副刊的认识，突出的仍是文艺性。20世纪90年代副刊的变革使副刊的文艺性大大弱化，非文艺性的专刊成为副刊的主角，这再次引发关于副刊的争议。目前新闻界主要有两派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将90年代以来非文艺性的专刊都排除在副刊之外，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必要在新闻、言论、副刊、广告这些传统的体例之外再立一个门户，就应该将专、周刊都放在副刊之内。本文赞成前一种观点，主张将专刊与副刊区分开来。非文艺性的专刊无论是版面式的还是附张式的都不能归入副刊，文艺性的专刊则无论是版面式的还是附张式的都可归入副刊。另外，关于副刊的界定，本文较为认同冯并的界定，冯并认为：“副刊是报纸的具有相对独立编辑形态，并富于整体文化和文艺色彩的固定版面、栏目和随报发行的附刊。”^②

(2) “四大副刊”

“四大副刊”指的是五四时期的《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京报副刊》。这里要说明的是，文学研究会附着于《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发行的专刊《文学旬刊》我们一律归入《晨报》副刊与《学灯》副刊，即《晨报》副刊上的《文学旬刊》我们统称《晨报》副刊，《学灯》副刊上的《文学旬刊》我们统称《学灯》副刊，不再专门指出。

2. 主要内容

本书从“四大副刊”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切入“四大副刊”的研究，主要运用文献分析的方法，在社会—历史、思想—理论、文化—文学的综合性视野中考察“四大副刊”。文章分四个部分展开：

第一章在中国报纸副刊发生发展的语境中论述了“四大副刊”的崛起。中国的报纸副刊自诞生之日起一直是通俗性的文艺副刊。五四时期，由于《新青年》影响、新式教育的普及以及媒介自身的原因，报纸副刊开始酝酿变革，产生了著名的“四大副刊”。“四大副刊”不仅打破了通俗性文艺副刊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副刊成为了集思想性、理论性、知识性、文艺性于一体的综合性副刊，而且改变了副刊的附属地位，使副刊成为精英文化的传播阵地，从边缘走向了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434页。

②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4页。

时代的话语中心。

第二章论述了“四大副刊”与“五四”新文化公共空间的建构。本章在借鉴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文化公共空间的概念，即：以评判的态度来讨论新文化的这样一个公共领域，它包括为这种讨论提供公共论坛的媒介空间，也包含了这种讨论的话语空间。《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公共空间的确立，“四大副刊”则与其他媒介共同拓展了新文化的公共空间。“四大副刊”以其传播时段长、覆盖率高、参与性广泛在新文化公共空间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为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的交锋、意识形态的论战、新文学的论争提供了公共论坛，同时，“四大副刊”也是新文化重要的批评空间，包括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对新文化与新文学的批评与反思。

第三章论述了“四大副刊”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开展。“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主要循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猛烈批判封建的思想文化以再造文明，一是大力引进域外主要是西方的思想理论资源作为启蒙的思想武器。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在前一章已经论及，这一章着重阐述后一个维度。五四时期对西方思想理论资源的引进主要表现在科学民主的倡导与各种思潮主义的输入。“四大副刊”从现代科学体系的阐释，专业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常识与科学应用的推广三个层面上向读者普及了现代科学知识，并对民主的内涵与民主的实现途径进行了探讨。“四大副刊”对新思潮的输入涉及种种主义，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流派、实证主义的输入力度最大。这些新思想新理论取代了封建的思想文化，为人的觉醒提供了理论资源。

第四章论述了“四大副刊”与“五四”新文学的生成。新文学的生成离不开主体的培育。从创作主体看，“四大副刊”为“五四”新文学培育了无数的文学新人，而且成为许多著名作家的重要园地。冰心、郭沫若、梁实秋、徐玉诺、许钦文、沈从文等一大批文学新人都是从“四大副刊”上走上文坛的，鲁迅、周作人等一大批著名作家的作品也都是在“四大副刊”上发表的。从接受主体看，“四大副刊”上翻译介绍的域外文学理论与作品，所刊载的新文学的理论阐释与创作，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为新文学吸引和培育了大量的读者。新文学的生成也离不开问题的实践与探索，“四大副刊”以其综合性成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各类新文学文体的实验地与演练场，同时，“四大副刊”上刊载的各类文体的理论探讨文章，为新文学文体的走向成熟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一章 从边缘到中心： “四大副刊”的崛起

“副刊”二字正式出现在中国报纸上，始于五四时期的《京报副刊》。但这并不意味着迟至五四时期中国报纸上才出现副刊，实际上副刊的发生发展与中国近代报刊的发生发展是相伴而行的。

第一节 副刊的发生与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的近代报刊，并不是脱胎于中国古代报纸，而是从西方横向移植过来的，但西方报纸上并没有中国报纸上常见的副刊。显然，副刊是中国报纸的独创，是一种“独特的报学及文学现象”^①。源于西方的近代报刊在它的中国之旅中为什么会产生副刊这一新的报纸元素？这需要我们深入探讨。

一、副刊的发生

中国的报纸副刊从诞生之日起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近代早期报刊均由文人所办。

中国是一个文艺大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培养了无数的文人，这些文人一旦中举，便顺利地走上仕途，从知识者变为权力者。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初试不中再试不中者比比皆是。鸦片战争后新闻出版事业的兴起，为

^①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1页。

这些文人提供了另一条出路——办报。文人办报有三种情况：一种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洋人出钱，秀才办报”，即报纸的老板是洋人，主编却是中国的秀才们，如1872年创办《申报》、1882年创办的《字林沪报》、1893年创办的《新闻报》等当时较有影响的大报，都是这种情况；第二种是中国文人自己办的报纸，如1874年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第三种是较之大报出现得稍晚一些的文人办的小报，以1897年李伯元的《游戏报》为其开端。

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文人办报并不容易。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小农经济开始自然解体，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整个社会对于信息有了一定的需求，这一切为报纸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毕竟有限，交通不便，封建统治的言禁未开，这使得报纸的信息量严重不足。当时报纸“有关中国的政治新闻，其主要来源，只能是来自北京的《京报》和所在省的辕门抄”^①。查阅当时的材料，“偶尔发现报馆人员向外国驻华使馆探听消息的事，还不曾发现有关中国官员（或官方机构）接受报馆采访的记载”^②。即使探访到官方的某些新闻，也会受到干涉，难于见报。比如《申报》曾刊登江南提督谭碧理到沪的消息，谭即派人来报馆交涉，横加指责^③。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指出：“甲午以前，报纸罕言政事，对于官场中人尤不敢妄加只字。”^④

担任过《新闻报》总编的老报人孙玉声则在《新闻报三十年之回顾》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犹轮轨未通迟滞。各埠访函之来，远道者十数日或数十日不等。即近如苏杭亦须二三日始达，电报则仅上喻（谕）可传外，其余无只字。故主政者于每日报中材料，颇感困难。一届冬令封河，京津各道消息不通。岁除各官署封印以后，未至开印，公牍俱无。致巧媳妇尤难作无米之炊。^⑤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03页。

②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03页。

③ 参见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03页。

④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⑤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可报纸每天得出，空出来的版面由什么填补呢？当时的报人们并没有受过新闻工作的职业训练，他们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文学熏陶，新闻文体的文学化是当时一个较为普遍现象。当时的许多新闻报道和标题都非常文学化，报纸的言论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而是脱胎于古代政论文的报刊政论文。一旦报纸出现空白，文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拿他们最熟悉的文艺性内容如诗词、寓言、对联、杂谈、游记、笔记文等来填补。比如王韬曾自述，他主编《循环日报》的时候，因“交通未便，消息难通”，“常述野语稗史以补之”^①，这就是早期报纸的补白。

当然，文艺性内容并不仅仅被当作补白的材料，也有聪明的报人看到了文艺性内容拥有巨大的读者市场，将之作为报业竞争的有力手段。1872年上海《申报》创刊时，为了和早于它十年创刊占领了一定读者市场的《上海新报》竞争，不再像《上海新报》那样将文艺性内容视为可有可无的补白与新闻、言论混编在一块儿，而是将文艺作为每天报纸必备的内容，集中放在报纸末页，时人戏称为“报屁股”。在创刊号的《本馆条例》中，《申报》声称：“如有骚人韵士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②《申报》的这一创举，在当时出版物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吸引了大批喜好吟风弄月、舞文弄墨的文人。征稿启事登出后，投稿非常踊跃，报纸末页的版面有限，容纳不下，《申报》于1872年11月又创办《瀛寰琐记》月刊，主要刊登诗词、骈文、笔记散文与小说等文艺作品，也少量地刊登天文、地理等知识小品和时事论文，《瀛寰琐记》成为我国近代第一份文学期刊。1877年《申报馆书目》曾介绍说：“是书皆近时诸同人惠投本馆嘱刊之作，本馆延请名人详加选择。”^③由此可见报纸刊载文艺作品之受欢迎。而《申报》在创刊当年就击败了《上海新报》，独霸上海报坛，除了重视言论、扩大新闻报道面、实行价格战，重视文艺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申报》上的文艺性内容由此成为报纸副刊的雏形，中国近代报纸的体例也由此基本形成，即由新闻、言论、文艺、广告四大块构成。

1882年，《上海新报》改名为《字林沪报》卷土重来。吸取十年前失败的

①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88页。

② 《本馆条例》，《申报》创刊号，1872年4月30日。

③ 《劝看〈民报〉》，《申报》，1876年5月19日。

教训,《字林沪报》开始也重视文艺,登出“凡有诗词歌赋嘱登本报者,概不取资”^①的征稿启事,并开辟专栏,取名为“花团锦簇楼诗集”,专门刊登诗词歌赋。1888年,《字林沪报》又成功地将长篇小说连载引入报纸。其实,《申报》创刊时也刊登过连载小说,但未能吸引读者,很快就取消了,改刊登诗词为主。而《字林沪报》的连载小说选择夏敬渠的《野叟曝言》连载,十分受欢迎,吸引了大量读者。

1897年,李伯元创办的文艺小报《游戏报》大获成功,报界兴起了一股大办文艺小报的高潮。小报的兴起,抢去不少读者,使《字林沪报》等大报面临新的竞争对手。尽管《字林沪报》每天有固定的版面刊登文艺性的内容,但和小报比起来毕竟版面有限、影响有限。《字林沪报》的编辑高太痴等人“因而就想摹仿小报,在《字林沪报》上搞些新花样。不过,他们又觉得小报上那些‘游戏笔墨’难登大雅之堂,于是便想出了在‘正张’之外另出‘附张’的办法,用专门版面来集中刊载诗词、小品、乐府、传奇之类带有消闲性质的作品”^②,取名为《消闲报》,随《字林沪报》附送。《消闲报》的诞生,不仅使副刊较之过去内容更为集中、丰富,而且使副刊具有了完整的编辑形态,独立性更强,地位更为稳固,影响也更大,因而学界一般把《消闲报》作为我国报纸的第一个正式副刊。

由上述可见,从可有可无的报纸补白到成为报纸的必备内容再到第一个副刊正式诞生,文人办报与报业竞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文人办报为副刊的发生提供了可能,那么报业竞争则直接促成了副刊的发生。

二、发生期的副刊

《消闲报》之后,各新闻媒介纷纷开设副刊,形式不同,叫法也不一。从形式看,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随报发行的附张式副刊,一类是占报纸正张版面的栏目式副刊。从称呼上看,有的叫余载、余录,有的叫丛载、丛录,有的叫谐部、说部,也有的叫附章、附页,等等。总之,报纸开设副刊在这一时期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然而,这一时期的副刊还处于极不成熟的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像《消闲报》这样坚持时间长、内容集中丰富、有专门的刊头、稳

① 罗贤梁:《报纸副刊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9页。

② 王文彬:《中国报纸的副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4页。

固的地位的副刊太少。大多数副刊或者不稳定、或者偏安于报纸一角，很难产生影响。比如1900年1月创刊于香港的《中国日报》，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第一张日报，它的副刊刊于其旬刊《中国旬报》上，初为专载谐文小品的《杂俎》，从11期起更名为《鼓吹录》。《鼓吹录》办得颇有特色，先后分设《小说》、《谐文》、《史谈》、《班本》、《词苑》、《粤讴》、《南音》等栏目，形式多样，文字通俗，亦庄亦谐，讥讽时政，很有战斗力，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可是，1901年2月出至37期，《旬报》停刊，《鼓吹录》也随之取消，其中一些内容移至日报的末页，影响不及从前。再比如《申报》，它是上海最有影响的大报，也是它最早将文艺作为报纸必备的内容，受到读者的欢迎。可是，从1872年创刊至1912年，副刊性的文字一直处于“报屁股”的位置不受重视，连专门的栏目都未设置，更谈不上精心编辑改进了。

其次，与副刊的内容相关。从发生之日起，通俗性文艺作品一直是副刊的主角。但通俗不等于低俗，通俗性文艺作品中也不乏有现实意义、有审美价值的文本，可这一时期的副刊上，占主要篇幅的大都是一些趣味文章游戏笔墨，有意义有价值的作品太少。以《消闲报》为例，《消闲报》在第2号上刊载了一篇《释消闲报名之义》，其文曰：

一篇入目，笑口既开，虽非调摄精力之方，要亦可为遣闷排愁之助也，此可为当道诸公消闲者也。或者高人韵事，酒阑灯焰，苦茗既熟，有约不来，走马王孙，倦游既返，深闺才友，刺绣余闲，既无抵掌之良友，复乏知心之青衣，得此一纸，借破岑寂，或可暂作良友青衣观乎？此可为高雅诸君消闲者也。甚或读书童子，读史传不得其门者，谈《聊斋志异》乃足启其聪明，读毛诗不知其义者，诵元人曲本乃适以开其智窍，此无他，诙谐易入耳。此则后来之秀，于正课之暇，亦可借此以消闲者也……^①

这一番与读者十分贴心的话实际上申明了《消闲报》的办报宗旨，即为当道诸君、高人雅士、深闺才友、读书童子等各类不同读者“遣闷排愁”。从这一宗旨出发，《消闲报》上占主要篇幅的是逗人一笑艳冶娱情的笔记谐文及诗词小品，有的作品甚至标题制作都带有艳冶娱情的色彩，诸如“将娇比艳，芙蓉可比香腮，以硬攻坚，萝卜能开石窍”之类。

再看《申报》，《申报》上的副刊性文字有诗词、笔记、谐文、寓言等，由

^①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84页。

于诗词占的版面少，一直是《申报》副刊最主要的文体。我们看两首《申报》上的诗词：一首为1872年5月7日《申报》上刊登的《后竹枝词》：“苏州大姐眼如波，山上娘姨情更多。觅得搥头无处所，暂时相会野猫窠。”^①另一首为1885年5月31日《申报》刊登的《答阮少楼见赠之作再叠前韵》：“海天万道接苍茫，早仰才名播远方。客路两心堪共证，词场一面快相当……”^②前一首趣味低下，后一首则为文人间唱和应酬之作，它们基本上代表了《申报》副刊诗词的风格。这样的风格就连报人们自己也不满意，《申报》主笔雷瑱在提及早期《申报》上刊登的诗词时这样评价说：“彼唱此和、喋喋不休，或描写艳情、或流连景物，互矜风雅，高据词坛，无量数斗方名士，咸以姓名得缀报尾为荣，累牍连篇，阅者生厌，盖诗社之变相也。”^③当然，这一时期的副刊也发表过一些好的通俗文艺作品。比如，《字林沪报》上连载的《野叟曝言》是清中叶出现的“才学小说”之一，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恐怕也是《字林沪报》连载此小说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此外，像《中国日报》的《鼓吹录》，也包括《消闲报》上刊载的一些揭露腐败、针砭时弊的笔记谐文，但这样的作品毕竟数量有限，不代表主流。

因此，发生期的副刊在媒介系统中的位置十分边缘化，人皆不甚重视。然而，发生期的副刊毕竟为自己在报纸上争得了合法的地位，成为报纸不可或缺的四大构件之一，为之后副刊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三、副刊的定型

1. 《时报》副刊的脱颖而出

1904年6月，与《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并称为上海四大报纸之一的《时报》创刊。《时报》创刊后，在报纸业务上锐意革新，在新闻报道上追求以速为主，在言论上首创严格意义上的新闻评论——时评，在形式上首创对开报纸两面印刷分为四版的现代版式，对于副刊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在发刊词中，《时报》专门列出下面几条：

第十一，本报每张附印小说两种，或自撰，或翻译，或章回，或短篇，以助兴味而资多闻。惟小说非有益于社会者不录。

① 《后竹枝词》，《申报》，1872年5月7日。

② 《答阮少楼见赠之作再叠前韵》，《申报》，1885年5月31日。

③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50页。